

反對「融合」者須反躬自省

□周八駿



知微篇

就在香港的反對派颯起一股反對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風潮之際，中央堅定不移地扎實推進香港融入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精心打造包括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大珠三角洲經濟圈。

9月6日，亦即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立法會選舉日前三天，國務院正式批覆《廣州南沙新區發展規劃》，將南沙新區提升至國家級新區。南沙新區面積約800平方公里，相當於香港的三分之二，此項目立足廣州，依託廣東省珠江三角洲，連接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致力於建設粵港澳優質生活圈。

10月10日上午，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廣州南沙新區發展規劃》。廣東省人民政府省長朱小丹在新聞發布會上指出，香港社會各界只要客觀地分析便會明白，內地改革開放是推動了香港發展，而不是阻礙了香港發展。

10月11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在深圳市龍崗區舉行校區開工儀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廣東省人民政府省長朱小丹以及國家教育部、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等部門相關負責人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也應邀參加。香港中文大學此番入駐深圳，被香港與內地教育界寄予探索境內外合作辦學新模式、促進兩地學術交流之厚望。

深圳不懼「洗腦」建中大校區

值得深思的是，港中大（深圳）招生要求和香港中文大學本部一致，學生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正式學生，畢業時授予香港中文大學學位。首期招生7000人，最終招生規模將達到1.1萬人。將採用雙語（中英）教學，着重通識和書院教育。師資面向全球招聘，可在香港本部和港中大（深圳）之間流動。港中大（深圳）採用理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以民主方式管理學校，充分尊重學術自由，營造開放的學術環境。

最高權力機構理事會由香港中文大學和深圳大學各委任八人組成，理事長由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出任，理事長擁有最終決策權。概言之，港中大（深圳）辦在內地，卻大體採取香港模式。

一年前，李克強副總理出席香港大學一百周年校慶典禮時宣布，內地有關部門將資助香港大學學生到內地訪學，被香港一些別有用者視為中央企圖給香港的大學生「洗腦」。不久前甚囂塵上的反對國民教育風潮也是以開設國民教育科旨在替香港莘莘學子「洗腦」為藉口。諷刺的是，這些害怕「被洗腦」者一直自以為佔據了政治思想道德高地，睥睨內地；而被他們視為處於人類政治思想道德低地的內地，居然敢於邀請香港的大學到內地辦學，大體採用香港模式教育內地學生，不怕內地學生被香港的大學「洗腦」。

為什麼自以為思想強大卻缺乏相應的心靈力量？對此，香港的反對派政治團體、政治人物何以為答？香港的一部分居民一方面充分享受著21世紀信息時代最活躍最豐富的資訊，一方面卻相信寥寥數十教時的現代國課內容能夠收「洗腦」之效，對此，難道不需要反躬自省嗎？

近10年來，在CEPA推動下，香港加速拓展與內地經濟一體化。今天，香港社會出現不可低估的反對聲音，主要就因為兩地融合深化產生了意識形態摩擦。香港一部分居民擔憂內地的主流意識形態浸淫香港，反對派借題發揮，炮製「拒中反共」風波。然而，內地卻以泱泱大度，在最具意識形態色彩的高等教育領域，向香港的大學開放。那份自信難道不正是「中國模式」的折射？

「赤化論」用心險惡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香港近10年來所發生的種種，是香港的反對派在折騰香港，也是一部分香港居民在自我折騰。今天，反對派政治團體炮製「香港被赤化」論，是唐吉珂德式的可笑表演，但包藏險惡用心。如果讓反對派得以售其奸，那麼，受損害的將會是香港大多數民衆的利益，將會是國家長遠的利益。

事實是，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不只是香港與國家主體之間的關係，在21世紀經濟全球化深入拓展的大背景之下，無論內地還是香港，都是既相互聯繫又分別與世界經濟其他部分相聯繫的。有人鼓吹「香港城邦」論，不只是鼓吹香港「獨立」，而且是要求香港脫離經濟全球化。有人揮舞港英旗，則更是赤裸裸地要求香港倒退，逆人類、國家、香港的進步潮流而動。對此，能無動於衷嗎？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博士



立會小丑 保龍

有話要說

日本在中日釣魚島爭端的尖峰時刻又玩起了「小動作」。據報道，為防止台灣與大陸在釣魚島問題上聯手，日本方面決定在年底前重啟中斷三年與台灣的漁業談判。此等敏感時期，日本釋放願與台灣洽談「漁業」信息，分明是避重就輕，以「漁利」為誘餌，引台灣上鉤。

日本以「漁利」誘台

10月7日，日本《讀賣新聞》一版頭題報道，日本政府決定恢復自從2009年2月以來中斷的台日漁業會談，預期今年內可以召開。《讀賣》報道指出，台日漁業會談主要的議題集中在釣魚島周邊海域的漁船作業規則，釣魚島「主權」問題與「漁權」問題脫鉤處理。台「外交部」次長柯森羅8日也首度在「立法院」證實，日本有意在年底與台灣展開漁業談判。台灣「外交」高層進一步透露，台日第17次漁業會談可望在11月舉行，地點在台、日之間擇一舉行，目前日本已提出具體時程及議題，包括維持漁業秩序等，但最終時間等還有待與日本進一步協商。據透露，雙方較為關注的魚群養護、漁業永續發展等均屬技術性問題，難度較低，在此次會談中應該可以獲得解決。

對於此次漁業談判，台灣「外交部」亞東關係協會秘書長黃明朗表示，台日漁業談判主要癥結在重疊海域的漁船作業問題，日本過去不願談，現在則表達善意「願意磋商」。

對此，台灣「外交部」發言人夏季昌表示，「期望盡快重啟漁業談判」，並希望能有具體成果，當局也會做好完全準備。夏季昌說，漁民作業長期受到日本干擾，海巡部門目前都有執行護漁任務；日本偶爾還是會用燈光等其他方式干擾，外事部門不希望這種狀況再發生。他進一步表示，漁權本來就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期盼日本充分尊重台灣漁民在釣魚島海域的合法作業權益。除了漁權問題之外，他指出，希望日方就其他相關議題進行整體性協商，包括漁業資源養護等。

台「駐日代表」沈斯淳也表示，雖然漁業談判的確切日期尚未決定，但雙方正在溝通協調當中。沈斯淳稱，漁權的問題涉及漁民的權益，是極為重要的事情，「代表處」一直積極跟日方溝通協調，期待漁業會談能夠盡速召開。

釣島主權是根本

中日釣魚島之爭，乃主權之爭。現在日本不談主權而談什麼「漁權」，分明是日本對兩岸施展的「離間計」，誘使台灣在釣魚島衝突上不要與日本激烈對抗，繼續高倡東海和平的軟調子。有些台灣媒體也認為，日本溫和態度其實意在拉攏台灣，避免兩岸聯手對抗日本。日本的《讀賣新聞》也直言不諱地認為，日本政府此舉是「擔心台灣如果在釣魚島問題與大陸合作，將造成對日的強大壓力」。

在保釣關鍵時刻，台灣方面如果響應日本拋開主權談漁權，顯然中了日本的圈套，吞下了以糖衣包裹毒藥的虛假善意，無異飲鴆止渴。無黨團結聯盟「立委」高金素梅日前接受訪問時就認為，馬政府定調只談漁權「非常荒謬」。因為「從歷史上來看，釣魚島就是屬於中國的領土」，「台灣根本不需要和日本這位外人討論釣魚島的問題」。

早從明、清開始，台灣漁民就在釣魚島周邊海域作業，日本在日治時期也是將此海域劃為台灣的作業區域。但在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長達67年之後，日本竟片面宣稱擁有釣魚島「主權」，鳩佔鵲巢，擅自劃定虛擬「暫定法線」，長期對台灣在釣魚島周邊海域作業的漁民從事干擾、阻礙、驅趕的舉動。

拿主權換漁權，根本是用大象換螞蟻，何況釣魚島本來就是我們的，不需要日本施捨什麼漁權。要識破日本的詭計，不可見小利忘大義，捨本逐末、浪擲祖宗產業而與日本談所謂的「漁權」。因此，當前在保釣問題上，應從共同維護釣魚島主權的民族大義出發，在日本廢止將釣魚島國有化之前，兩岸同仇敵愾，堅持對日本「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原則，逼日本調整釣魚島立場，還戰後應有的國際秩序。

（蘇虹，博士，上海市政府工作人員；何溢誠，復旦大學台籍博士，國民黨中央委員）

「特惠生果金」旨在扶貧

□曾淵滄

香港有一些人不顧歐洲、日本人口老化拖垮整個國家經濟的前車之鑒，執意把西方已過時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搬到香港推行。很明顯，他們是想騎劫「特惠生果金」，將之變成非正式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為此，建議特區政府在正式向立法會提出撥款申請時，棄用「特惠生果金」的名義，而以「貧窮長者援助金」計劃的方式提出。



指點香江

一群反對派議員剛上任，就忙於組織、游說其他議員聯手反對政府長者特惠生果金的財政撥款申請。為什麼反對？因為他們認為政府不夠大方，發放特惠生果金要經過資產審查，他們要求取消資產審查，凡65歲長者一律每月領取2200元的特惠生果金。這些人的行動也得到部分社會學的學者支持。長期以來，香港有一些人不斷地要求政府成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認為只有這麼做才能徹底解決香港人口老化的問題，這些人現在就很期望把這個特惠生果金逐步轉化為他心目中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政府絕對不能再退讓

張建宗局長一直是很盡心盡力為勞苦大眾謀福利的局長。不過，張局長也看到西方國家今日的困境就是起源於不斷增加的福利，知道政府福利該適可而止，知道政府資源有限，只能集中起來分配給真正有需要的人，而不是搞民粹、扮大方，為爭取掌聲而胡亂派錢。

我認為張局長在長者特惠生果金問題上絕對不能退讓，寧可一拍兩散。若反對派真能聯合部分建制派議員否決撥款，那就由他去，不要再提什麼特惠生果金了，讓失望的老人去問投反對票的議員們要錢。

不過，政府亦有個缺點，一心想扶貧但又擔心接受資助的貧窮者被標籤，不高興，想在金錢上幫助他們又要照顧他們的自尊，不希望他們被標籤為窮人。過去幾十年，政府一直不願意為貧窮線下定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擔心

下了定義之後，處於貧窮線下的人就被正式標籤為窮人。

向低薪的人士分發交通津貼，分明是扶貧計劃，開始的時候，交通津貼只是發給跨區工作的低收入者，後來有人覺得審查跨區工作得花不少行政費用，就乾脆廢掉跨區工作的要求，只要出外工作，不論工作遠近，只要是薪水低者，可發放交通津貼，那些在同區工作，步行上班者也可領取交通津貼。實際上，這麼一搞，已名不正，言不順了。現在不少人就想利用這個特惠生果金的機會，把特惠生果金化為非正式的全民退休保障金。雖然張建宗局長不斷地說特惠生果金是扶貧不是敬老，但是，一旦用上生果金這個名義，就無法與敬老不拉在一起。

應區分扶貧還是敬老

一年多前，曾蔭權亦同樣為了增加生果金而加上資產審查一事被搞得焦頭爛額，最後不得不投降，取消資產審查。當年曾蔭權宣布通過資產審查讓貧窮老人領取更高的生果金，結果引來巨大的反對聲音。人人都說生果金是敬老的，既然是敬老，就不應該搞什麼資產審查。幸好，當時曾蔭權所增加的生果金金額還不算太多，比目前所建議的特惠生果金低很多，政府總算付得起。當時曾蔭權實際上也是想通過生果金的渠道來扶貧，以免正式標籤誰是貧窮的老人，結果是人人不領情，政客趁機借政府的庫房來爭取自己的選票。

很明顯的，當年曾蔭權犯的錯誤，今日梁振英、張建宗重犯，依然想用生果金的名義來扶貧，加上「特惠」兩個字以示分別。但是沒有用，「特惠」就不是扶貧，而是送禮，既是送禮，實在沒理由搞資產審查。

正名是很重要的，名不正，言不順，今日特惠生果金面對的困境就是名不正，言不順的問題。特惠生果金的本意是扶貧，要扶貧，為

什麼不直截了當的說扶貧，為什麼不直截了當的向立法會申請一筆錢來扶貧？可以堂堂正正的說扶貧，不妨稱之為「貧窮長者援助金」，與目前的生果金全面分開，沒有任何關係，獨立發放。目前為敬老而發的生果金可以原封不動的發放，想大方一點，可以65歲以上者與70歲以上者一視同仁，如果政府直接向立法會申請「貧窮長者援助金」而完全不提生果金，相信沒有多少位立法會議員會反對，也沒有什麼好的理由反對。

改稱「貧窮長者援助金」

香港的確有人口老化的問題，但問題不該與扶貧拉在一起，應該分開處理。人口老化該從鼓勵長者工作、增加強制儲蓄的比率及改善醫療保障制度等着手，從長計議，問題非常複雜。今日的歐債危機，相當程度就是受到歐洲多個國家過於優惠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所累，人口老化越嚴重，全民退休保障計劃面對的問題就越大。簡單的說，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就是正在工作的年輕人拿錢來養老人。但是，年輕人如何養得起越來越多的老人？任何國家或地區，一旦實行全民退休保障，年輕人就會放棄儲蓄習慣，把錢花光，他們以為當他們老的時候政府會養他們，結果當他們老的時候，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破了產，政府養不起他們了。今日的「歐豬」諸國正面對這個困境。

香港依然有一批人不能正視歐洲、日本人口老化拖垮整個國家經濟的問題，依然把數十年前過時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搬出來，希望在香港推行。很明顯地，目前一些人就是想騎劫特惠生果金，將之變成非正式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而不是扶貧計劃。為免扶貧計劃遭到騎劫，建議特區政府在正式向立法會提出撥款前，放棄用特惠生果金的名義要求撥款，而是以正式的「貧窮長者援助金」計劃的方式提出。

作者為城市大學副教授，博士

探索中庸穩健新政治觀

□陳群



神州點面

隨著中共十八大臨近，國內外對「中國政治走向」頗為關注：中共新領導集體將怎樣面對「左」右兩方面壓力？中國政改將走向何方？政治觀是否會有變化？近日，《人民論壇》雜誌開展「新政治觀探討」，學者們出於對政改及中國前途的關切，提出各自「新政治觀」。筆者也該點淺見。

面對兩種困惑

「黨的十八大即將勝利召開。作為已經執政六十多年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如何跳出『歷史周期律』，帶領中華民族實現全面復興，是擺在黨和國家面前的時代課題。」《學者稱我國亟待確立新政治觀》一文稱，「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有一個現象讓人困惑，為什麼我國經濟社會實現巨大發展，民衆的幸福指數並沒有得到相應提高，社會矛盾大量積聚，衝突燃點不斷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於政治觀未能與時俱進。確立現代政治觀或曰新政治觀迫在眉睫。」《新政治觀：創新點與突破口》一文更尖銳：我國的經濟體制較計劃經濟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走出很遠的情況下，政治體制改革裹足不前，必然導致錯位，進而產生矛盾和衝突。小則羈絆中共提高執政能力，影響經濟持

續快速高效發展，大則危及執政。

筆者多次提出相反的困惑：既然中國政體落後，為什麼經濟反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超越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還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應基本肯定還是否定？這個反詰不是反對政改，而是主張深思中國新政治觀究竟是什麼？政改之路何在？

繼承特色政治

天津師範大學佟德志教授認為，「現代政治觀念在中國的傳播和形成，基本取決於中國傳統文化政治觀念及其與西方政治觀念、馬克思主義政治觀念三者互動的結果。」筆者以為，「三大因素互動」形成的中國獨特政治，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中國政體不同於任何國家的特色所在。因此，中國政改絕不簡單是「文革之法」「全盤西化」或者「新思維」「普世價值」之類所能解決的難題。中共新領導集體當然明白，「左」右激進派最終都成不了氣候，但對於「新思維」「普世價值」之類則要慎重。一者，猴都具有共性，人類當然有「普世價值」。但關鍵在於，「普世價值」不僅是「西方民主自由」等舶來品，還有「百善孝為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中國造，還有印度造、阿拉伯造等等，可惜迄今聽到的「普世」論，大多局限於「大麻煩」，如艾爾巴喬夫「新思維」對俄羅斯是解體，對外有西方策動民族肢解、內有軍閥混戰傳統的中國意味着什麼？中國獨特政治世無先例，只能「摸石頭過河」。

筆者以為，中共有兩條不會動搖：一是不會

「走老路」——以階級鬥爭為綱，回到「文革」前體制；二也不會「走邪路」——全盤西化，走西式資本主義道路。「普世」論者會說「錯！我們主張的是西方民主政治。」筆者要問，當今美、日霸權主義、軍國主義算不算「西方民主政治」？

政改必須穩健

在美國「入亞」、日本玩火嚴峻形勢下，相信中共新領導集體在政改上更將注重「繼承與創新」關係。繼承意味着穩健，創新體現於中庸。比如對「普世價值」或可探討，但「普世」不等於「西化」。有些「普世」論者，自覺不自覺仍在主張政治西化，除去其確有可鑒之處外，更與西方強行輸出價值觀、多年「西式洗腦」形成「西經入骨，祖傳全忘」有關。比如西倡「法律至上」，儒崇「德主刑輔」，後者顯然高於前者，我們卻棄高就低。治國除弊確實缺法，但更缺之德。筆者反覆指出，中國傳統政治文明有頗多可鑒之處，西方啟蒙思想家霍爾巴赫、狄德羅、愛爾維修、盧梭、格拉姆、達隆貝、伏爾泰等都曾力挺。霍爾巴赫《社會的體系》指出「歐洲政府非學中國不可」，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所知唯一將政治的根本法與道德相結合的國家。」他們認為，儒學導致十七世紀法國「精神的革命」，推動了十八世紀「中華文化的歐洲啟蒙」等等。天方夜譚麼？但這是事實！

筆者以為，中國將「不復古而鑒古，不西化而學西」，探索博採古今中外之長的中庸穩健政改路徑。期待中共新領導集體拿出大智慧，以中庸穩健之道改革、完善中國特色政體。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